



# 她是国际间谍吗？

——日本歌星、影星 李香兰自述

〔日〕山口淑子 著  
藤原作弥

天津编译中心 译

# 她是国际间谍吗？

——日本歌星 影星 李香兰自述

〈日〉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天津编译中心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全国改革文史库 22.4.22

责任编辑：吕兴惠

**她是国际间谍吗？**

——日本歌星、影星李香兰自述

李香兰 藤原作弥 著

天津编译中心译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8年10月第一版·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375插页：1 字数：245千字

印数：1—25,000册

ISBN 7—5034—0060—9/K·0051

定价：3.30 元

## 译者说明

本书是日本山口淑子——藤原作弥所著的《李香兰 我的前半生》的中文译本。

在本世纪40年代，李香兰以影星、歌星的姿态，活跃于我国的东北、华北以至上海的广大地区，红极一时。

但是，李香兰又有着潘淑华、山口淑子的名字。那么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扑朔迷离。她的出身、经历如何？鲜为人知。她以后又到哪里去了？也为大家所关心。这些问题，在许多人当中都是个谜。

本书系统、清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李香兰，即山口淑子（结婚后名大鹰淑子），是纯正的日本人。然而生于中国，从小学习汉语。后来又寄养在李际春、潘毓桂的家里长大，是他们的义女，并在中国的学校上学。她才艺出众，又有着一个美丽的中国名字。在东北和上海，与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了多部中国影片。唱了多首中国歌曲，使当时的许多中国的观众、听众为之倾倒。所以往往被误认为中国人。

李香兰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自己的人生路程。是复杂曲折，变幻多彩的一生。在中国，从松花江畔到黄河之滨，直到当时的十里洋场的上海，她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后又经历了中国——日本——美国的旅程，重又返回日本。在职业上经历了由歌手、演员、广播节目主持人而

成为日本参议院议员、内阁环境厅次官的政界人士的人生历程。

李香兰——山口淑子是把自已放在中日交恶的历史时期，从一个被日本当时的国策所播弄摆布的“小人物”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但是在1978年6月她以堂堂的日本政府环境访华团团长的身分，重新踏上了自己度过青春时代的中国国土。与我国的有关人士和她的新知旧雨畅叙友好之情。她关心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带来许多有关环保的资料送交我国政府。并且在长影欢迎她的宴会上，一再地表示悔罪，一再地表示愿意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所以我们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李香兰”了。

书中所涉及的一些事情和人物（其中有些人仍然健在），因作者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和与这些人的特殊的关系，自有作者自己的态度和感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有的地方与实际有所出入。我们尊重作者，都按原书全文直译，未作丝毫节略改动和另加注释、说明，请读者注意分辨。

本书的一——六章由熊达云翻译，七——十四章及附记、后记部分由孙雷门翻译。一——六章并承金默玉女士校正。遗憾的是，第七章以后部分完稿后，恰值金先生接待来访的日本友人，因而未能续请校订。另外，天津编译中心的编译组的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对、整理工作。

限于水平，书中失误之处实多，敬乞海内外方家指正。

天津编译中心

1988年7月21日

# 目 录

## 译者说明

- 第 一 章 抚顺时期…………… ( 1 )
- 第 二 章 奉天时期…………… ( 19 )
- 第 三 章 北京时期…………… ( 41 )
- 第 四 章 天津时期…………… ( 62 )
- 第 五 章 李香兰诞生…………… ( 82 )
- 第 六 章 新京时期…………… ( 102 )
- 第 七 章 在《苏州夜曲》前后…………… ( 123 )
- 第 八 章 “日剧”被围事件…………… ( 141 )
- 第 九 章 我的爱情故事…………… ( 163 )
- 第 十 章 芳子和淑子…………… ( 184 )
- 第 十 一 章 虚幻的影片…………… ( 208 )
- 第 十 二 章 《万世流芳》…………… ( 229 )
- 第 十 三 章 夜来香狂想曲…………… ( 251 )
- 第 十 四 章 上海· 1945…………… ( 274 )
- 第 十 五 章 别了！李香兰…………… ( 294 )

## 附 告别李香兰之后

后记之一

后记之二

# 第一章 抚顺时期

我对中国大陆的回忆始自抚顺。

以大露天煤矿而闻名遐迩的抚顺，是满铁<sup>①</sup>经营的煤矿之城。现在涌现萦回在我眼前的，是那远处的梯状蓝色绝壁，像巨大的贝螺壳的螺纹一样，一圈、一层地向谷底蜿蜒盘旋而去。沥青色的煤层、货车的行列、远处的汽笛轰鸣声、飘荡在远方工厂上空的黑烟——那血红色的太阳渐渐沉没在大溪谷中。

1920年2月12日，我降生在中国东北部（旧满洲）、现为辽宁省省会沈阳（旧奉天）近郊的北烟台。我诞生后不久，由于全家迁至抚顺，因此，幼年时代的往事几乎都是抚顺的事情。

满洲原野高粱地里的落日是有名的景色。然而抚顺的夕阳更衬托出露天煤矿的宏伟景观，夕阳把盛开在煤矿道旁的马蓼花映得更加通红。

但是，我居住的地方是抚顺市内叫做六条大道的中心街。露天煤矿的矿区位于市区南郊，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只有在郊游或参观时才去那里。

---

<sup>①</sup>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是日本对华扩张、侵略的据点。——译者

日常的生活日程只是与小伙伴俊子及美都里穿越市中心街，往返于南大街的永安小学之间。

顺着东七条大道一直往东，从东三番町的拐角处至穿过抚顺神社的纵横交叉的棋盘式街道，是一条白杨遮空的林荫道。至今提起抚顺，比到处是烟囱的煤矿景象，更清晰地浮现我脑海中的，是那灼耀人目、耸立青空的、绿油油的白杨树的景色。

现实中的抚顺市街，是一座反映了促进资源开发国策的，生产活动繁荣，但又是害怕遭受抗日武装袭击而整日战战兢兢的煤矿之城。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抚顺是一座秀丽清新的白杨林荫道与露天煤矿那溪谷的远景调谐一致的、宁静的丘陵城市。此外还有要好的同学们，慈祥的父母，可爱的弟妹……

不过，这种宁静的生活，也只是限于在“满洲事变”爆发以前的事。

我在抚顺长到12岁。直到我18岁那年的秋天，在一次短期旅行中首次访问东京以前，对日本这个祖国是全然无知的。是所谓的“满洲生，满洲长”。

虽然我生活在日本人当中，讲日语，但后来我又以“李香兰”这个中国艺名，讲汉语、并且还成了用汉语歌唱的女演员去演出，成了一个国籍含混不清的人。

战前，一个懵懵懂懂地被形势推着走的姑娘，本想热爱两个国家——一个作为祖国而爱，一个作为故国而爱。然而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是在相互对立，相互交恶的。

但是，深刻饱尝到类似双重国籍者的悲哀，则是在相当以后的事情。抚顺时代，我是一个毫不懂事的极其平凡的女



孩子。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父亲山口文雄，1889年出生于佐贺县<sup>①</sup>。我的祖父博，是个士族出身的汉学者。父亲在他的熏陶之下，学习汉语，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06年因向往大陆奔赴中国。

在北京结束学习后，经友人介绍在满铁找到工作，从烟台采煤所调至抚顺煤矿。由于他精通汉语，又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及民情，因此他在满铁一方面教职工学汉语和讲授中国情况，另一方面好像还担负着抚顺县顾问之类的工作。

我会讲中国标准话（北京官话），其基础教育完全是从父亲那儿接受到的。父亲与当时到中国去的一部分日本青年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忧国忧民气质的人。他学习汉语极其热心，中国的熟人朋友也很多。

进入满铁前，父亲就读于中国语专科学校同学会。那时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李际春、潘毓桂等战前的亲日派。这两人是财界要人和政治家，担任着重要职务，并按中国的风俗与父亲结拜为盟兄弟。根据同一风俗，我也和他们建立了礼仪上的养女关系，获得了“李香兰”和“潘淑华”等中国名字。

母亲也是九州福冈县人。母亲的父亲石桥近次郎经营漕运趸批业务，后因铁路的发达使漕运趸批业务难以维持，于是举家搬到了朝鲜的京城（今汉城），后来移居中国，投靠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舅舅。

---

<sup>①</sup> 佐贺县，位于日本九州地方西北部。——译者

父亲山口文雄与比他小五岁的母亲石桥爱（爱为译音——译者）是在抚顺相识、结婚的。他们到底是恋爱结婚，还是通过媒妁之言结婚，因为明治时代的人绝口不提这种事情，从而无法知晓。

父亲虽在日本修过汉文书籍和汉语，又在北京的同学会读过书，但按日本的学制，仍属自学之人。相反，母亲却是毕业于东京日本女子大学的所谓知识女性。

母亲的教育方针很严厉，特别是对礼节礼貌要求更为繁冗。同时还让我这个算术很差的人，到寄宿在东本愿寺（抚顺下院）的学生那里补习。

但是，母亲也有孩子气的一面。当我们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泥土家家时，她不仅不加呵斥，反而和我们一起，弄得浑身是泥，一块奔跑嬉戏。

在学习科目上，我喜欢国语和音乐，对算术和体操则极为怵头，最得意的是音乐。父母对我这个长女寄予了一种朦胧的期望，很热心地对我施以教育，但不是像内地（指日本国内）那样，因为是女孩子而叫我学习插花、茶道、烹调和缝纫等。

相反，让我学习小提琴、钢琴、筝等乐器。从学校下课回家，我必定得和两个小伙伴一起游戏，两天上一次音乐课，晚上一定要听父亲的汉语讲座。尽管是个孩子，可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喜欢唱歌，唱得好像还凑合，有时还代表年级在文娱会、音乐会上表演过独唱。

父亲极为认真地培育我学习汉语，似乎希望我将来能找一个使用汉语的职业，从事日中关系方面的工作。由于他自己担任的是满铁顾问、抚顺县顾问等非正式的职位，因此，他

好像希望我通过做政治家的秘书、翻译等途径，成长为一名政治家或记者。

幼儿园时代，父亲一有闲暇就叫我坐在他桌子跟前，一对一地教我学习汉语发音。升到小学后，又让我参加由他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的晚间汉语讲座。我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混在成人堆里，受到了一个成年学生的待遇。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无论是从地理、历史还是从民族性上看，都是一个广袤的大地。虽然一般都称作中国语，但它包含着许多种语言。虽然在日语中也经常听说青森方言和鹿儿岛方言之间，隔阂难通，但它远不能与中国的方言相比。中国语中的方言，与其说方言，毋宁说是一种独立的外语，反而更清楚一些。在这个国度里，语言随地方而异，意思的沟通十分困难，其中只有一种首都北京使用的语言是全国共同使用的正统的标准语。父亲教我的就是这种北京标准话。

在战前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接受了欧化思想的洗礼，英、德、法等西方的外语教育受到重视，而把汉语纳入正规的语言教育的学校极少。

因而像父亲这样的好学之士，学习汉语的途径，通常是在日本的汉学学塾学习汉诗、汉文，然后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等地方学习、掌握实用的中国语和关于中国的知识。

这时，作为中国语教材而广泛使用的是《急就篇》。《急就篇》由宫岛大八编纂，是战前日本声价最高的、唯一的一套中国语课本系列书。宫岛大八这个人，在明治初期曾与川岛浪速（后作为川岛芳子的养父而闻名）及二叶亭四

迷<sup>①</sup>等一起，在明治初期的外语学校学习中国语。他反对政府轻视汉语的政策，始终坚持在野精神，开办“善邻学院”，是中国学的巨璧。

父亲学习中国语用的也是《急就篇》，并进一步在中国现地进行了磨砺锻炼。而父亲在抚顺作为语言讲师，向满铁员工讲授北京标准话时，使用的教材也是《急就篇》；而且，我这个参加听讲的女儿，从初级到高级学习使用的，也是同一个课本。

当时，在满铁工作的日本职员，为了谋求与中国人圆满地沟通思想，学习北京官话是规定的义务。

全国统一的国家考试的检定资格，从初级到高级共分五个等级：四等、三等、二等、一等、特等。如不具有这种检定资格，满铁不录用为正式职员。如果获得高级资格，月薪也高。因此，听讲者学习都十分勤奋努力。

父亲教授中国语是白天工作结束后的晚间讲座。抚顺满铁研修所的礼堂里，每晚挤满了许多日本职员。我上小学低年级时，听的是初级讲座，四年级时取得了检定四等的资格，上高年级后听中级讲座，六年级时取得了三等的资格。

我这个留着孩发的“小不点儿”(父亲给我起的绰号)是听讲者中的唯一小孩，并且是唯一的女性。

父亲先教每一个单词的发音和文章朗读的示范，认真地讲解其意思及用法，接着由全体复诵。然后，让一个一个学生反复练习。大人们结束后，最后轮到我：“淑子，发音试试。好，它是什么意思？”我回答完毕，父亲满意地点点头。

<sup>①</sup>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日本著名小说家、翻译家。1867年发表日本最早的一部口语体小说《浮云》。——译者

现在我不打算在这里讲解最近几乎不使用的中国语，但中国语，尤其是北京官话的发音确实非常复杂，难以掌握。

例如送气音。数字的“七”发音“qi”，如发成不送气的“ji”，就有可能搞错为“鸡”的意思。

父亲把这些发音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例如在进行送气音“qi”的发音练习时，父亲说：“各位同学，把手纸拿出来，不是擦鼻涕。把手纸裁成细长条，把一头蘸上唾沫贴在鼻头上。对，就是这样。好，下面开始练习qi的发音。一、二、三：‘qi、qi、qi’。”

大人們的鼻頭上都耷拉着一張細長的紙條異口同聲地練“qi、qi”的發音。這種光景局外人看來很滑稽可笑，而父親的學生們，包括我，作得都十分認真。

除了父親特別訓練的漢語外，我是個極其平凡的女孩子。

我和附近醫院的柳瀨俊子、隔壁飯館的女兒小川美都里三人，從一年級起就是同班的好夥伴，干什么都在一起。並在一起學習小提琴和鋼琴。

三個人無論什么都要一樣，在同一个西服店里做同样的衣服，在同一天穿；背同样的书包，穿同样的鞋；每月同一个时间到同一家理发店剪同样的发型。对了，发带也是一样的。如果有谁不小心出现差别，违反了“协定”，那在这三个女孩子的圈子里，就成了生活中的大问题。

总之，那是平凡而和平的孩提时代。但是，那时成年人的世界已是战云笼罩的世界了，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的1931年9月，抚顺附近已燃起了日中15年战争的炮火。爆发了“满

洲事变”。

起因是日本军部在离抚顺以西仅50公里的奉天郊外柳条湖（当时误称为柳条沟）挑起的铁路爆炸事件，即“九·一八”事件。

从那时起，我就被迫背上了时代之子的命运，但孩子的生活圈中仍然是优哉游哉，我丝毫不记得这次爆炸事件。

但是，第二年，即1932年的那一夏夜的事件，一直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有时还出现在梦中。

深更半夜我被摇醒，当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床上爬起来时，我瞧见母亲脸色苍白，父亲正穿好衣服要出门。时值午夜，可是外面一片混乱嘈杂，充满了车辆的往来声、人们的呼喊声。“也许要出大事，快起来穿好衣服！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要离开妈妈。”

这一年，我12岁，是抚顺女子学校的一年级学生。我下面有四个弟妹，但年纪都很小。“淑子是姐姐，要沉住气！”父亲说完便匆匆地出去了。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沉住气。到底出了什么事呢？问母亲，回答也不得要领。“满铁来人把你爸爸叫到事务所去了。”母亲只说了这一句，没有再给我做详细解释。

母亲就像母鸡拥抱雏鸡一样，把弟妹们搂在一起，直愣愣地瞪着眼睛。过了一会，只向我一人指了指窗子。

我瑟瑟缩缩地靠近窗边，为了不弄出声响，小心谨慎地把雨淋窗掀开一条细缝。从隙缝间向外望去，夜空被照得通红。

建筑物的屋脊，还有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就像剪影画一

般黑黝黝地耸立着，但是它的背景则是熊熊燃烧着的火海。火舌在舐卷遥远的夜空。我想：“啊！是着火了！”可是嘴里说不出声来，这时虽然是夏季，可是我的牙齿却上牙碰下牙地不停地打战。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明白发生火灾的方向正是露天煤矿的采煤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火灾事故。如果仅仅是火灾，离得又不近，母亲肯定不会如此大惊失色。而且，城里灯火通明弥漫着紧张气氛。

母子六人互相拥抱着，渐渐地火头被控制。凶猛的火势在减弱，火光逐渐被拂晓的曙光所淹没，就像身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迎来了黎明。

我们再次钻入被中。弟妹们很快就入睡了。只有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又站在了窗子跟前，打开窗户向外观看。天空正泛鱼肚白。我把下巴靠着窗边，回忆着刚刚发生的烧焦了夏季夜空的无情的烈火。

随着夏季早晨的阳光的照射，清楚地映照出眼前土地的颜色。抚顺的土质是彩度很强的红褐色。

我家对面是实业协会（商工会会议所）它的庭院一直延伸到我家的窗户下。我和俊子、美都里在傍晚洗完澡，总要穿着“浴衣”<sup>①</sup>到这广场来乘凉休息。

我打开窗户，周围突然喧嚣起来，许许多多的男人大声嚷嚷着走了进来。他们是宪兵和穿便服的日本便衣。走在前头的是一位被蒙着眼睛，双手绑在身后的中年中国人。他被握着绳索另一端的宪兵牵着，踉踉跄跄地移动着脚步。

---

① 浴衣。指一种日本和服式的宽松凉爽的衣着。——译者

从服装上看，那位中国人看上去是个苦力头。所谓苦力是中国劳动者中的最低层的工人。

一行人把苦力头绑在广场中央的一棵大松树上，摘下了眼罩，他的脸正朝着我这个方向。我胆战心惊地看着这种异常的情景。我总觉得被绑着的那个人的眼睛正在看着我。在周围，中国人、日本人越聚越多。

紧跟着就有手持步枪的宪兵开始大声地讯问什么。我知道他们是在厉声斥责，可内容不清楚。

苦力头咬紧嘴唇，侧着土一般颜色的脸，一言不发。宪兵又是一阵大声呵斥，可他仍不开口。宪兵的声音越来越粗野，可中国人还是瞧着别的地方不予理睬。

突然，宪兵把手中的步枪倒过来，用枪托使劲地毒打中国人的额头。我情不自禁地捂着眼睛时，停止了毒打。只有那在空中挥舞着步枪的大弧形的余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接着，呼呼的鲜血从被打得低着头的男人额头顺着胸脯往下淌。

被绑在松树上的苦力头的身体瘫软下去，此后就不动弹了。大概就是因为那一击而气绝身亡的。

鸦雀无声的群众再次发出了声音，人墙组成的圆圈重新围住了松树。一下子，男人的躯体好像被抹掉一般的不见了，简直就像是被这些人流掠走了似的。人的圆圈时而前后、时而左右地挤来挤去，吵吵嚷嚷地散开了。这时，广场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只剩下松树依然孤零零地挺立在那儿。

我平常看熟了的实业协会的广场，早晨那刚刚升起的光照在协会建筑物的正面，白墙泛射着明亮的光辉。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陷入了某种错觉之中。那是一场噩



梦！眼前难道不是我经常观看的晨景和同一幢和平的住宅吗？

我飞快地跑出家门。母亲在身后叫我停住，我还是一溜烟地跑到了广场。松树根部的泥土上淤结着血渍。追过来的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我才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

本章的开头，我曾写到，抚顺时代的回忆令我不能忘怀的是街道林荫树白杨的绿色，可那只是小学时代的抚顺市街的小景。

升入中学后，煤矿附近“匪贼”不断频繁出没，所以无事禁止远出。由于日军抚顺守备队兵力不足，成立了由官厅及满铁的在乡军人<sup>①</sup>职员组成的民间“防备队”，各街道也组织起了“自警团”。

1932年，抚顺留给我这个12岁、开始认识世界的女学生的颜色，正从白杨林荫树的“绿色”转变为“红色”。那是战火的“红色”——是那天晚上的大火，是拷问后的广场上的泥土的颜色，也是从苦力头额角上流淌下来的鲜血的颜色。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后来直接听父亲讲，那是“土匪”对抚顺煤矿的袭击事件。

当时，满洲的土匪中，“大刀会匪”、“红枪会匪”、“马占山军”等以势力庞大著称。其中，“红枪会匪”是一种宗教团匪，是一支勇猛强悍的“土匪军”。他们手持红缨枪，相信吞饮护身符后可以刀枪不入。袭击抚顺的据闻就是这支“红枪会匪”。

---

<sup>①</sup> 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按日本旧军制，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及退役军人，平时参加工作和生产，战时须应召服役。——译者